

我的后半生

张举直

区委老干部局邀请我在今年的全区老干部理论培训班上作一次正能量宣讲,谈谈《我的后半生》。当然,我还有前半生。其实我的前半生比后半生更为坎坷。我生于1936年,从出生起健康生活的时间只有6、7年,其余都被病痛折磨。8岁那年,我得了骨结核病,髌骨溃烂,疼得彻底难眠。当时正处于战争之际,社会不稳定,医疗条件差。10岁左右病情逐渐加重,被抬到方桥后顾村,请那里的一位顾姓中医外科医生,在没有麻醉的条件下,硬是把我烂掉的髌骨碎片腐肉脓血从腿上扒了出来,疼得我浑身被汗水浸透。顾医生医术高明,我的病情逐渐好转,但还是落下了残疾。高中二年级因生活困难休学后,我到高级社当了出纳员。那时残疾人得不到像现在一样的照顾,是被排挤的。极低的工资无法养家糊口,于是我偷偷去教育局报名登记当代课教师。1956年“八一”台风过后,我去江口郑家埭小学代课,从此走上了教育岗位,一干就是37年。1980年,我调入奉化中学。1983年,我被调到奉化检察院,白天调查,晚上备课,边办案边上课,从此与法律结缘。后来,我参加了学制两年的律师函授培训,学成后,教育局又派我去杭州大学法律系学习有关课程,此后在奉化电大授《国际私法》课。1993年,奉化第一家合伙制求是律师事务所成立。我提前两年退

休,来到了这家律师事务所,一干就是8年。在浙江省司法厅组织的一次全省法律工作者统一考试,我成绩合格,取得了民事案件代理资格。2010年我已70多岁,体力不支,老去医院。老伴劝我继续上班,我不愿意去。其实我早就想好要组织一伙老友,干点事,向老百姓普法宣传,免费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我先找的孙常熊,他原先是检察院经济检察科科长,退休后在一家银行当法律顾问,我常去他处。我说明来意后,他立马同意了。在老干部活动中心,我碰到了法院退休的林崇庆同志,他在求是律师事务所与我共事了8年。加上我的邻居谢定康,于是就有了四位老同志。我找到了新民社区(2003年起我免费担任该社区法律顾问)的许亚春书记商量,她爽快地将社区小会议室让给我们做活动场地。有人有场地,我们就开始商量工作计划:一是叙事聊天,老年人很需要;二是学习法律知识。学法不能中断,时代在前进,法律在不断修改完善。三是借助这一平台,开展普法宣传,向老百姓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那时,孙常熊和我都是77岁,谢定康、林崇庆已八十出头,后来被称为“爷爷团”就是这个道理。

2011年8月17日举行了“新民社区法律工作室”授牌仪式,“爷爷团”法律工作室正式成立,当天我向居民群众宣讲了《民间借贷应注意的问题》。次日,奉化日报头版作了

报道,奉化首家社区法律工作室成立。从此社区里2000多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得到免费的法律援助。每周三上午,我们几位老同志在工作室里坐班,接待前来咨询的群众,从不缺席。现林崇庆88岁,一年住两次院,出院后就马上“上班”。孙常熊患有眼疾,白内障手术后带墨镜“上班”。2017年谢定康离我们而去,这使我们更努力工作,知道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工作室提供的法律咨询与一般律师事务所不同,我们会面对面肩并肩,促膝谈心,依据法律把他们内心的问题全部一一分析清楚。很快,工作室细心周到的服务在群众中口口相传,经《宁波日报》报道后更是名声在外。余姚、慈溪、镇海、北仑、鄞州等地的老百姓远道而来,经常把工作室挤满。有时我们会动员周边的群众延迟一天前来,先帮远道而来的群众解决问题,让他们皱眉而来舒眉而归。至今为止,前来咨询的群众已经覆盖全宁波。最远的是一位武汉武昌的群众前来咨询。他说他是从四川成都的一家《文摘报》转载《宁波日报》看到法律工作室事迹的,慕名前来咨询。

截至今年4月10日,法律工作室已接待来咨询的群众1177人次,这还不包括电话咨询。我们有两只手机24小时开机供群众来电咨询,有时候凌晨4点多,晚上8点多也有人打入电话。我们还为群众代写法律文书。虽然曾经我们几位老同志间有约定,因为年事已高,“动口不动手”,但在群众

的强烈要求下,这个约定被打破,截至今年4月,工作室已为居民群众代写法律文书121份。有一次一位居民将好不容易积蓄了10万元借给他人后无法回收,我们给他代写了民事诉状。他拿来600元钱作为酬谢,我们谢绝了。有对两夫妻是因老家邻里关系纠纷成了被告,苦恼于如何出庭,在法庭上讲些什么,经朋友介绍找到我们工作室。后来,那位介绍的朋友告诉我们官司赢了,这让我们非常欣慰。

8年来,我们把接待群众的法律咨询台账编纂起来,每年一本,其中两年为各两本,共10本。我们把自2011年法律工作室成立以来各类媒体新闻报道的文字和照片归纳起来共两万多字和多幅照片,作为工作室的历史档案。经过多年努力,我们还出版了书籍《法律就在你身边》,共22万字,素材来源于自1993年起人民法院报《现在开庭》栏目里面的有关内容,总共编了276期案例,内容有案由简要、案情、陈述、判决和专家点评。部分案例,我们还研究布置了思考题。经过多次校对和完善,这本书现在是老年大学法制课的一本教材。

“普法工作做得好,居民纠纷自然少。”这正是我们成立法律工作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的故事

蚕豆和大麦的记忆

王述梓

在我的儿童时代,家乡洪溪一带,冬春季节田野里一望无际都是蚕豆和大麦,人们称为春花。那时一季单季稻,一季春花。农民粮食不足,麦和豆是重要的补充。大麦又称米麦,是粮食。蚕豆是豆类蔬菜中重要的食用豆之一,作菜吃。记得从上小学读书起,我就种豆麦吃豆麦,可以说豆麦是伴着我长大的。60多年过去了,至今记忆犹新。

豆和麦的种植季节在初冬。那时候我家包括轮着的众家田,每年种两亩多田。水稻收割完毕,就到了冬种时间。我在星期天和假日参加种豆种麦劳动。那时种植农作物

严格按照季节,农作物按季节生长,蚕豆的生长期是冬至见叶、清明结荚、立夏见粒。豆和麦大多数是混种,叫做米麦蚕豆,少数单独种。它们喜旱怕湿,尤其是大麦有晒断大麦根,磨断磨担绳的说法。种植时要整地作畦,用木杵打孔,一行打四孔,打一行退一步,直到另一头。接着是往孔里放豆子,每孔两粒,我总是跟着打孔的大人放豆子。然后是每孔盖一拌拌有麦子的焦泥灰。这样米麦蚕豆就种好了。不用浇水,不施肥的肥料。

初夏,豆麦先后成熟。咸菜煮蚕豆味道不错,吃一碗也能饱腹。蚕豆营养丰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碳

水化合物、维生素等,有健脑、益胃等多种作用。接着大麦黄了,那时学校会放农忙假,小学生要下地摘麦头。然后是豆荚变黑,蚕豆老了,就帮着摘豆。摘完豆,晒干脱壳,春花收获就完成了。

家家户户用大麦作粮食,我家也一样。把大麦炒熟,磨成粉,用开水冲泡,搅拌成糊状吃,解决肚饱问题。蚕豆的吃法很多,可作炒蚕豆、油炸兰花豆、蚕豆芽等等。最高兴的是我们小孩子了,有酥豆可吃了。酥豆也就是炒蚕豆,松脆有香味,那时农家孩子没有糖果等零食吃,酥豆几乎是唯一的零食。蚕豆收上后家家户户都会炒酥豆。但炒酥豆要有技巧,先要用水把

豆泡涨,再晾干,掌握好干湿的程度是炒好酥豆的关键,太湿太干都不行。当达到适当湿度时,用四尺锅拌炒,蚕豆会粒粒爆开。我家年年炒一斗多,四个兄弟姐妹平均分配,各自保管。每天下午去学校时我会装一口袋,给班里要好的同学分一把,所以我总是兄弟姐妹中最快吃完的。自我去奉化读书后,家里就再没有炒过酥豆,我也不参加种豆种麦劳动了。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水稻产量提高,食品丰富了,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大麦、蚕豆也只少数人少量种植,无人炒酥豆了。现在糖果糕点、花生坚果等应有尽有,人们在新时代过上了新生活。

■奉邑风情

一块红石板的故事

王开甲 单忠国

人老了,总想说些往事给后人听,就算是老人唠叨吧!下面,就说一个红石板的故事。

在碧波荡漾的亭下湖水库的库底,在原亭下村遗址的荷花池头,静静地躺着一块红石板。有人说,这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红石板。有人说,它是一块价值连城的鸡血石。到底谁说得对,已无法查证。但是,它确实身世不凡,是北宋时期哲宗赏赐给亭下村单杞学子的一块御石。这就有点稀罕了,为什么皇帝会赏他一块御石?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据《亭下村文史资料记载》:北宋英宗时,东阳县有一位进士,其嫡孙名叫单元晟,在游历奉川时,站在妙高峰上眺望,见足下有一处盆地,两条小溪,各自西、北方而来,在盆地东侧汇合后,缓缓向东流去。盆地四周青山叠翠,可谓山青水秀,是一处宜居之地,遂卜居于此,繁衍生息。因该地位于雪窦山的御书亭下,故取村名亭下。

据传,元晟公共得五子,个个好学。元二子单杞,又名邦昌,天资聪颖,学业超群,一直攀升至京城内舍生,并被聘为太学教师。太学师长见其有教书育人专长,特恳请皇上恩准,赐其银两回乡举办义学(学塾),并赐红石板一块,以作留念。

那块红石板,长2米、宽1米、厚约10厘米。沿运河南下,运至大埠后,改由竹筏拖运至旧时的高岙村口。那里离亭下村不远,用人工抬运已不成问题。人们见状,十分好奇,围观者众多。过不了几日,单杞邀集木工、石工、泥工诸巧匠,

■我的故事

忆求学艰难之“行”——看70年交通巨变

何培兴

“衣、食、住、行”是衡量我们幸福指数的主要依据。看到今天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不由得想起了童年艰难的求学之“行”。

因父亲早逝,家庭变故,我从小寄养在外婆家。1953年,8岁的我上学了,外婆家在尚桥附近的一个小山村,离学校大约5里地,沿途要经过荒坡、河塘、高低不平的石板路,还有两个有狗、有疯人的村庄。我每天手拎蒸饭的米和菜,跟在三四年级的哥哥姐姐后面步行去上学,早起晚归,人小胆怯。

二年级下半学期一个寒冷的冬天下午,北风呼啸天下鹅毛大雪,放学时只见田野、村庄白茫茫一片,路上积雪已达一寸多厚。我与同村几个三四年级的小同学排着队,手撑雨伞举步维艰,脚下传来“咔嚓”“咔嚓”的踏雪声。我穿着外婆买的那双“久经磨练”的跑鞋,感觉脚底森森的冷。行至赵家村过了“文明桥”,我的小脚感到透心地冷,仿佛浸在冰水里一样。我俯首一检查,发现鞋底已磨出一个洞,雪水就是从这里渗进鞋里。于是我干脆把鞋扔了,雪地上便出现了一串小小的赤脚印。漫天雪花还在飞舞,开始,我光着脚丫还能走一小段路,后来冻得刀割一般地疼,再后来,麻木失去知觉不能行走。我进退无路,欲哭无泪。此时才懊悔无知的自己竟茫然做出这样的错误决定。最后是五年级大姐姐背我到家——童年的“行”是一段苦涩的路。

70年弹指一挥间。喜看今日奉化,纵横交错的现代交通与几十年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沈海高速、甬金高速穿奉而过;“四季花香”的金海路直通阳光海湾;奉化火车站停靠的是和谐号动车组;私家车比比皆是,还有形似蛛网的公交线路遍布各个乡镇,家门口便能登车上路;高龄老人享受免费乘车。今天的市民出行真可谓“便捷”之极。

忆往昔求学“行”愁眉不展,看今朝出门便喜笑颜开。共和国70华诞,我要为您祝福,为您歌唱!

在自家祖屋旁边的一处空地上,仿京城太学的格调,建造义学校舍。校舍有门楼3间、东西厢房先后建造20间,膳房5间。校舍中央设有用鹅卵石铺就的400平方米操场两个,厢房内挖有供师生饮用的水井一口。校舍大门宽约5米,两旁各有1.5米高的青石擂鼓1只。石步阶五阶,每阶按宽40厘米、厚20厘米规格,由鄞江梅园石叠成。门楼前挖有一个约300平方米大小的池塘,池中种植荷花,池边建造廊屋数间。将京城带来的御石——红石板,架在池塘的进水口上,取名黄桥,寓意黄门秀才。这是奉西最早的一所义学,培养了一群不凡学子。据嵩溪单氏宗谱记载:“宋元佑年间(1086-1093),亭下单邦昌奉诏回乡办义学,在亭下村荷花池头建立学塾,造有学塾楼20余间,供四方志士入学攻读,造就学生上百名。”据《亭下村文史资料》记载,期间单氏族中荣登进士1名,举人10余名,秀才20余名。

据传,南宋迁都临安后,理学家朱熹,时任浙东巡抚,闻知亭下村的义学,特来巡视,并亲自给师生开讲理学的渊源与儒学的实践,鼓励大家学成后,济世安邦,治国理家。一次,朱熹来亭下学塾讲学时,恰逢亭下单氏村民修建宗祠,村民恳请朱熹题写匾额。朱熹欣然同意,题写了“理学名宗”四个大字。因义学校园坐落在嵩溪江畔,朱熹提议将义学取名嵩溪书院。后人为纪念朱熹,在后来造谱时,谱名也取名为嵩溪单氏宗谱。村民还特地在校后小晦岭南麓,建造了一座亭子。朱熹、戴表元、陈著、单庚金四位文学大家,先后多次来此处吟诗赏景,后人遂将此亭取名为“四仙亭”。